

Wai Guo

外国文学
研究中的
新发展

Wen Xue

主编 张月超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丛书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

主 编 张 月 超

副主编 许 汝 祉
王 智 量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986·南京

• 内容提要 •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是从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和第一期讲习班中精选出来的论文汇编。由张月超教授主编。论文作者中有著名的老一辈专家，也有活跃于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和外国专家。这些论文对欧美文学史上的若干重要作家、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或比较研究，对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文艺方法论派别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和评析，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观点比较新颖，反映了当前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水平。本书可供外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高校文科师生、文艺理论工作者等阅读参考。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扬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9375印张 304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336·004 定价：2.60元

责任编辑：曹林芳

前 言

去年初夏，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在南京成立，同时，以“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为题，举行了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和第一期讲习班。参加这次活动的共三百余人，老中青三代集于一堂，可谓盛况空前。这是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力量的首次大检阅，也是一次经验的大交流。

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学术活动的成果之一。

我们收到的论文近百篇，但因篇幅所限，又因几位同志未及定稿，所以这里仅收录二十二篇。论文的作者有国内知名的老一辈专家，大多数则是中青年同志，还有一位美国朋友。

论文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有的是属于传统的作家作品论，但提出了新的观点；有的是对某一民族、某一历史阶段文学或某一文学现象的较为宏观的研究；有的是对国外文艺新方法论的评析。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对外国文学研究能有所启迪和深化，对外国文学教学可资参考，对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能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受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委托，许汝祉教授、王智量教授和我共同承担了这部论文集的选编工作。杨正润同志为文稿的蒐集整理做了不少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使本书能及早同广大读者见面，均极应感谢。

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开端。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的全体同志将继续努力，为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月超

1986年5月

目 录

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朱维之 (1)
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	李赋宁 (11)
对美国新批评派的评价.....	张月起 (19)
论莎剧的情节结构.....	赵 澧 (41)
西方文学与人性论、人道主义.....	许汝社 (58)
谈谈二十世纪西方莎评的几种流派.....	涂淦和 (83)
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评雨果的《悲惨世界》.....	冯汉津 (100)
论《复活》.....	余绍裔 (115)
不应忽略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	
的浪漫主义.....	智 量 (131)
哈代小说中的悲剧因素.....	赵砾坚 (153)
漫话D.H.劳伦斯的诗.....	高冬山 (165)
传统与创新的结晶	
——茨威格的人道主义和小说艺术.....	熊玉鹏 (176)
说不尽的卡夫卡	
——如何认识卡夫卡的作品.....	孙坤荣 (193)
1915—1985年美国文学的现代派	
与后现代派..... (美国) 迈克尔·特普	张子清译 (216)
瓦西里耶夫的战时题材三部曲.....	陈敬咏 (228)
苏联近三十年来的文艺政策	
及其对文艺发展的影响.....	李明滨 (240)

“解冻文学”与“伤痕文学”

- 当代中苏文学思潮比较……………倪蕊琴 (268)
- 论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陈 慧 (289)
- 现代西方文艺心理学述评：弗洛伊德……………杨正润 (303)
- 谈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性”
 - 结构主义批评及其给我们的启示……………张连奎 (320)
 - 当代西方文论的后结构主义……………刘 康 (332)
 - 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概观……………林亚光 (355)

希伯来文学研究的新途径

朱 维 之

世界上有许多文明古国，其中能独立自成体系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而且影响深远的有四个——中国、印度、希伯来和希腊。它们所积累的四大文学宝库，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了后代世界文学的四块基石或四根台柱。闻一多在他的名篇《文学的历史动向》的开头一段说：“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即希伯来）和希腊——都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特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再过几百年，在四处思想都醒觉了，跟着是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的出现。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地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地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四个自成体系而影响深远的文学中，有三个算是我们的外

国文学。印度是老朋友了，跟我们已有二千年的交情；希腊是近、现代才认识的新朋友，我们的同志中有人曾“言必称希腊、罗马”，表示很亲密；只是对于希伯来的文学，却很陌生，曾一度成了禁区，好多同志不敢去碰它。到了（本世纪的）八十年代，才有人敢于公开谈论它，开始研究它。希伯来文学研究，在我国成了一片新开辟的园地。希伯来文学研究本身就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途径。

希伯来民族的文学宝库——“希伯来圣经”、“次经”和《外传》——产生于纪元前十二世纪到纪元一世纪之间的一千多年间。从公元前三世纪时就开始陆续被译成希腊文，并向欧洲和非洲传播。在基督教成立后，这个文库被吸收为基督教圣经的一部分，被称为“旧约全书”。它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而扩大其流传的地区，随着基督教在欧、非地位的提高而增长其在欧洲和非洲文化中的地位，甚至比佛教文学在中国的地位还要高。佛教文学翻译成中文（包括汉文、藏文和蒙文）后，对中国的文艺思潮影响极大，佛教思想成了中国三大思潮之一，儒、道、佛三教并列，有时甚至凌驾儒、道而上之。但总的看来，佛教思潮总不及儒学的地位高，儒学在我国历史上常占统治地位。在西方的中世纪，基督教则为最高的权威。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这个文库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随后又被译成亚洲、非洲和世界各国的文字，翻译语种之多，发行数量之大，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新文字，以及地方方言的新文字。其普及性远远超过佛经的翻译。

希伯来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由研究而写成的书籍、论文，真可说得汗牛充栋，可以成为一个图书馆。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之间，有犹太人的拉比（文士或教师）们，反复讨论、研究“摩西五经”，整理、注解、疏证，有如我国汉至宋代的学者们所做的“十三经注疏”的工作。他们这种工作及其成果叫做“塔慕德”（Talmud，

是“学”的意思，有类我国的“经学”）。他们所着重研究的是法律，口头的和成文的。同时，还有一种与此平行的研究叫做“弥达拉许”（Midrash，是发掘、考证之意），着重在发掘历史上的名人逸事、传说、寓言，考证失传了的史料。那些逸事、传说、寓言、稗史，对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戏剧有相当的影响。这是希伯来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也化了很大气力去研究它，但方法不对头，钻牛角尖，如讨论一枚针尖可站立多少万天使；天使到底有几只翅膀等问题，繁琐而无聊。那时读书受教育的权利被僧侣阶级垄断了，拉丁文的圣经译本不是一般平民所能读的，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但在十二世纪时，有两个犹太学者（拉希和伊本·以斯拉）提出了大胆的论点，说《申命记》不是摩西写的，指出许多证据。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圣经》被译成欧洲各民族的语言，一般平民也得以阅读了。从十七世纪起，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等开始作高级的圣经批判工作，就是历史的考证工作。斯氏的《神学政治论》列举圣经中的矛盾、重复、缺漏等。十八世纪法国的霍尔巴赫（1723—1789）的《袖珍神学》则以辛辣、幽默的讽刺笔调作无神论的批判。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圣经批判学达到了高潮，尤其在德国，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卡尔·马克思大学时代的师兼友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选听过他的《以赛亚书》课程。恩格斯对于圣经批判工作也很感兴趣，他说：“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中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恩格斯自己在这门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在晚年，他写出《启示录》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等颇有分量的论文，为研究基督教历史铺成科学的道路。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圣经批判学另有新的发展，注重了考古学方面和文学方面的研究。从此，正式的圣经文学研究开始了，并且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旧约全

书》即希伯来圣经的文学作系统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我们今天的希伯来文学新的研究工作作了出色的预备工作。

首先要提到的是被称为旧约文学研究的泰斗的德赖弗(S. R. Driver), 他的巨著《旧约的文学》(1891)出版以后,一直被看作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是牛津大学钦定希伯来文教授,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英、德、法等国的文字,蒐集了大量的资料 and 前人研究的成果,繁证博引,行文严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清理圣经各卷的写作过程、材料来源、编写方法和结构等,并指出各卷的文学体裁、重复处和疏漏处。书中有详细的注解,书后有希伯来文的索引,为二十世纪的希伯来文学研究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其次是摩尔顿(R. G. Moulton), 他的《圣经之文学的研究》(1895)一书风行甚广,我国曾有冯雪冰等的译本,广学会出版。该书把圣经各卷作了细致的文学体裁研究、鉴定,引起人们对圣经文学的广泛兴趣。他还把全部圣经各卷按照他所鉴定的形式重新排印,成了几十册的《现代读者的圣经》,为小泉八云等所称道。摩尔顿是芝加哥大学的文学教授,后为剑桥、伦敦大学的文学讲师。他的《文学之现代的研究》曾在二十年代,为我国一些大学采用为“文学概论”课的讲义。他的特点是以一个普通文学家的身份来研究圣经文学。不过他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希伯来民族的文学。

1901年出版了一本《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和文学》,作者艾博特(Lyman Abbott), 他受了德赖弗和摩尔顿的影响,和十九世纪后半叶“新批判”风暴的启发,把圣经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中去考察。该书的特点是注意古代希伯来人社会的生活和历史的发展。虽然局限于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突出宗教的作用,却能初步走出神秘的牙塔,到社会生活中去察看希伯来的文学。

1913年出版了两本简明扼要的、关于希伯来文学的书。一本是牛津大学希伯来文教授格雷(G. B. Gray)的《旧约书的评

介》，从原文订正一些旧译文的谬误处，简明地叙述希伯来文学的发展过程，沿着德赖弗的方法，深入而浅出。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穆尔（G.F.Moor）的《旧约全书的文学》，把《旧约全书》当做希伯来民族文学来研究，简明地叙述各卷的文学性质。这两本书都能简短而明快地把权威的著作深入浅出地交代出来，但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1922年，出了另一部较大的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教授贝弗（J.A.Bewer）的《旧约书的文学》。此书除吸收了上述各书的精华之外，还有它的特点，就是对旧约文学作美学的欣赏。他用自己的语言，从原文重新翻译一些经文，特别注意原文的文字技巧。但该书写作时受世界大战的影响，未能完成原定的计划，如《雅歌》、《约伯记》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未论及。

渡边善太的巨著《旧约书的文学》，第一分册《旧约书的诗和剧》（1923），第二分册《旧约书的历史文学》（1924），综合欧美各家的成果冶为一炉，加上东方人的观点，作了对比，是一部难得的著作。十年后，同志社大学教授科布（E.S.Cobb）的《旧约文学概论》（1935）也是综合德赖弗以来各家研究的积累，为远东学者而写的巨著。它的特点是把旧约各书逐卷详论其材料来源、思想主题、文学的结构，并且以自己的见解，逐卷加以评论，品评其价值的高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暂时使这项研究工作削弱，但仍有重要的著作发表。裴华（Robert H.Pheiffer）于1941年发表的《旧约绪论》，代表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新探索。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又继承战前新批判的浪潮，出了许多的专著，更多注意考古学上的发现和文学体制的研究，特别可注意的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为最新的利器。他们在个别经卷方面，深入而细致地研究其写作年代、社会背景和文风等。这种研究，在德国更为兴盛。1965年发表的欧兰根大学教授弗勒（G.Fohrer）的《旧约导论》，是根据塞林（Ernst Sellin）的《旧约导论》第十一版而

加以增订与重写的，总结了几十年来的各家研究成果，涉及希伯来文学的各方面问题。1980年，美国辉顿学院教授舒尔慈（S. J. Schultz）的《旧约如此说》第三版，是我们所见的关于这方面的最新专著，也是总结最新研究成果的书，注重考古学方面的成就，比弗勒的书简单而明了。

总看以上所述，从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各家的圣经文学研究，从“圣经批判”到最新的比较文学方法，都是以宗教为体，以文学为用的。“圣经批判”的目的是要弄清宗教的历史，其中合理的核心——科学精神，为恩格斯所肯定。圣经的比较文学，即与近东几个古国如巴比伦、亚述、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埃及等的文学、历史、社会生活等作比较研究，无疑也是对整个比较文学有相当贡献的。这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留给我们的成果，我们可以借鉴、参考。

我们的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于希伯来文学还很陌生，要研究这样的一个新课题，势必不能不走一条新的途径。我们今天提出这个新课题来研究，和过去二千年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学者们的研究是不同的，和一个世纪以来欧、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有基本不同处，所要探索的是新的途径，

第一，一个世纪以来，欧、美、日本的希伯来文学研究，以大学的神学院为大本营；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清希伯来宗教的源流、本质和发掘的历史，文学不过是表现宗教意识的手段。我们现在研究的新课题，却是世界文学史的一个部门。我们大学中的文学系有“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这门课，“希伯来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章。我们的目的是要弄清世界文学中这一部分的发生、发展、特质和影响，赏析它们的艺术特点。过去一个世纪中，也有人走这一条路，但是被排斥了，说是纯美学的观点，是他们务要避免的路。我们现在所要踏上的新途径正接近这条不可避免的路。

第二，一个世纪以来，欧、美、日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

者，多数把研究的对象叫做“旧约文学”，就是基督教经典一部分的文学研究，或“圣经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圣经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圣经文学”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基督教的经典；而“希伯来文学”不包括《新约》而包括《次经》和《外传》等古希伯来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学遗产。《旧约全书》是基督教的叫法，它原来是犹太教的圣经或希伯来人的圣经，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二者被混淆了。如波兰科西多夫斯基的《圣经故事集》（已有两种中译本）许多人以为是基督教圣经的故事集，其实不是的，编者站在犹太人的立场，编的是“希伯来圣经的故事集”或“旧约故事集”。这个误会也贯彻在一个世纪以来的“旧约全书”文学研究工作中，他们从事的是基督教经典中一部分的文学研究，而不是希伯来民族文学遗产的研究。我们现在要进行研究的新课题正是古希伯来民族的文学遗产。不过，为了研究这民族的文学，不能不涉及它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思想意识等。

第三，我们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革命的立场、唯物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宗教问题也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对希伯来文学中的宗教信仰问题，既不唯心主义地宣传，也不唯心主义地或形而上学地无视它或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者决不逃避难题，而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对待它。我们面对宗教学这门陌生的科学，不要有任何畏惧，要象但丁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这是马克思引用《神曲·地狱篇》第三歌，地狱大门上的铭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85页）马克思对宗教问题谈得很多，很精

彩。“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巧妙的比喻，就广泛地被人们引用过，现在还常被引用着。可惜这个比喻被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人所歪曲，形而上学地奉为马克思的宗教定义，是对宗教罪案的定讞，不求甚解地认为这个比喻就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全部论断。这是坐井观天，以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实际上，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视它的。因为德国近代史和宗教关系太密切了，德国的改革和振兴，都和宗教分不开，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文学、哲学思想的革新，都纠缠着宗教问题，都首先要解决宗教问题；直到马克思生活的十九世纪还是如此。所以他化了很大的气力去研究、讨论宗教问题，去探讨宗教的本质、作用、发生、发展和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他在研究、探讨宗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它在发生时对人类意识进化中的意义，神话产生时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后来对于社会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势力、支配力量等等。无论如何，宗教是社会的存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现象，不能把眼睛一闭，就说它不存在，说一概都是荒谬的就算完事。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有宗教的存在，在人民的生活中都有它的活动历史。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都有占重要地位的时代，即使后来有些低级宗教成了历史的陈迹，也变成了民俗学的内容而继续保存下去。高级宗教都产生艺术，即使它们消灭了，它们的艺术仍是人类的财富。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时，不能不遇到它的宗教思想、民俗的内容实质；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它。我们在研究希伯来文学中，遇到宗教问题时，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是从研究世界文学出发，做科学研究的，既不宣传宗教，也不做批判八股文章。

文学界对希伯来民族文学发生兴趣以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从十六世纪起，整个欧洲文化受它的影响。至于研究，起初是个人的爱好，而不是专门的研究；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兼诗人、狂飙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德，首先天才地发现圣经中的诗歌，歌德也加紧学习希伯来文，去欣赏希伯来文学。十九世纪初，法

国的雨果认识到圣经到处是诗，犹如海水充满着盐份一样。从此西方的诗人、文学家多爱好圣经文学，在大学里把希伯来文学当作民族文学或世界文学的宝库来研究。例如1936年，剑桥大学教授查德威克（Chadwick）等出版了《文学的成长》一书，把早期希伯来文学跟欧洲、印度等古代文学并列，研究它们的发生和成长的过程。在东方研究希伯来文学是从学习外文开始的，最初的教师是西方人，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时（1893—1903），特别欣赏詹姆斯王钦定英译本，说它是用音乐的迷人的文字写出的，甚至译错的地方，往往要比原文更加美丽。他特别推荐《约伯记》和《传道书》。他的介绍，对日本和我国的文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兴趣。1925年，在上海的朱克（A.E.Zucker）为中国学生编了一部英文的《西方文学》四大卷，第二卷是《圣经与中世纪》，把《圣经》当作西方文学来讲。1930年，在北京的詹姆森（R.D.Jameson）为清华和北大学生用英文编写了一本教材，一千五百多页的《欧洲文学小史》，第一、二章是导言和古代历史背景，第三章一开头就讲希伯来文学，然后讲希腊文学；第六章论述亚历山大时代文学时，又化了两大节讲希伯来的哲学和诗歌。他完全把希伯来文学揉入欧洲文学之中。这一方面表示希伯来文学对欧洲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表示编者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该书最早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希伯来文学，作出了贡献。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把希伯来文学当做亚洲一个民族的文学来研究则是最近几年的事。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卷，首先给希伯来文学以一席之地，其中有关希伯来文学的大小条目近二十条。1983年华北、华东几个大学协作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开始为古希伯来文学辟了专章，旗帜鲜明地把它插在亚洲的地图上。同一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册也出版了，其中也有《古希伯来文学》的专章，列为“亚洲古典文学”

的第四章，也是旗帜鲜明地把它插在亚洲的地图上。我国各大学已先后开始在“亚非文学”课中，讲授希伯来文学，并开始踏上研究的新途径。我们目前的具体任务是：（一）要用唯物史观分析公元前约一千年间希伯来社会的实质、如何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到了奴隶社会的末期，如何掀起奴隶起义的斗争，如马卡比起义和两次犹太人战争的分析；如何从奴隶社会开始封建社会的萌芽等。（二）要分析希伯来人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演变，亚卫一神教的社会起因及其对民族的作用等。（三）要注重希伯来文学史的研究。按一般文学的发展原理，分析希伯来文学发展的特殊情况，及其文学的特色。如希伯来神话、传说、史诗的特点，先知文学、智慧文学的特殊意义等。以前欧美的学者有的强调希伯来文学史研究的困难，有的只把旧约各卷写作的前后排列一下，却没有联系社会发展的情况，如启示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等。（四）进一步做好比较文学工作。欧美学者虽已把比较研究作为希伯来文学最新的研究方法，但他们还只重视平行的比较，即与美索不达米亚诸国泥版楔形文字的资料，以及埃及、腓尼基文学残章断片的平行比较，而对影响关系的比较，还很不充分。现在我们要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希伯来文学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

李 赋 宁

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发展，朝着更科学、更准确的方向进行。批评家们所努力追求的是一种更“客观的”、更抽象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上的“认识论”或“本体论”相联系。同时这种文学批评又非常具体，它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放在作品的形式上面。强调作品各组成部分（主题、情节、人物、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作品运用语言的特殊方式和技巧。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批评从英国批评家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威廉·燕卜苏开始，在美国得到蓬勃的发展，形成了“新批评”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有J.C.兰塞姆（Ransom）、艾伦·塔特（Allen Tate）、克利安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R.P.布莱克默（Blackmur）和W.K.温默萨特（Wimsatt）等。同一时期在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学派以F.R.利维斯（Leavis）和他的剑桥大学同事为代表，他们办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名叫《细察》（Scrutiny）。1932—1953年，这些英、美文学批评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重视作品本身，另一方面也看重作品的认识价值、文化价值和道德意义。他们反对用读者对作品的主观反应或个人印象来评价作品。而主张对作品中能够客观地辨认的成分进行准确、细致的分析。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必须仔细阅读作品本文。另一方面，他们也象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安诺德（Matthew Arnold）那样，重视作品的文化价值。他